

# 穆斯林移民在德国 及其 社会融入\*

胡 雨

**摘 要:** 经过半个世纪的移民浪潮,穆斯林人口在德国迅速增长,形成了以土耳其裔为主体的穆斯林社群。与此相应,各类伊斯兰组织不断扩展,为穆斯林移民提供了广泛的宗教社会服务,也成为争取自身宗教认同、文化要求及政治权利的载体和动能。然而,受制于弱势社会经济地位、特殊生活方式,加之社会普遍存在的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敌视、排斥、歧视及恐惧情绪,导致“穆斯林问题”的高度种族化、政治化、安全化和病理化的趋向。吸纳与整合穆斯林移民业已成为德国政府和社会一个无法回避且亟待解决的挑战。

**关 键 词:** 德国; 穆斯林移民; 穆斯林问题; 社会融入; 伊斯兰伞状组织

**作者简介:** 西南科技大学 政治学院 副教授 博士 四川绵阳 621010

**中图分类号:** C911; D751.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13)03-0069-12

---

\* 本文系作者主持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西部规划项目“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XJAGJW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的导师、哥本哈根大学欧洲伊斯兰思想中心约尔根·尼尔森(Jorgen S. Nielsen)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受全球移民浪潮的持续冲击,迄今为止,德国近8200万总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由移民及其后裔所构成,族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性已为现实生活的社会事实。<sup>①</sup>在此脉络下,以土耳其裔为主体的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成为德国公共话语和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议题。整合吸纳处于弱势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迥异宗教文化认同的穆斯林移民,无疑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任。本文拟考察穆斯林在德国形成的历史过程,探究其社群生活、宗教组织的基本轮廓以及政教关系,剖析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碰撞,检视穆斯林融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 一、穆斯林在德国的形成与现状

源于战后经济重建与繁荣,劳动力严重匮乏的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陆续与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签署客工(Gastarbeiter)招募协议,自此穆斯林客工便络绎不绝地进入德国。<sup>②</sup>按德国政府的最初设想,客工仅是暂时雇佣关系的外籍劳工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外来移民。据此,客工计划带有短期合同、定期轮换、集中居住、单身男工为主等特点,其目的在于防止客工的滞留,德国从未考虑过客工定居和公民权事宜,招募政策完全是为解决劳动力暂时短缺的权宜之计。<sup>③</sup>受石油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的影响,德国于1973年底废止客工计划,并鼓励客工返回原籍却效果不彰。紧接着,家庭团聚移民、难民、庇护者及非法移民的持续涌入,致使穆斯林人口大幅增长。1961年德国仅有6500名穆斯林,1989年陡升至180万,2002年已达340万。<sup>④</sup>据2009年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BAMF)的人口普查,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在380万到430万之间,约占总人口的4.6%~5.2%。其中,土耳其裔有250万至270万之间,占穆斯林总数的63.2%,东南欧50万(13.6%),中东30多万(8.1%),北非约30万(6.9%),南亚东南亚18万(4.6%),伊朗7万(1.7%)。<sup>⑤</sup>另据皮尤中心估算,2010年德国共有412万穆斯林,占总人口的5%,是欧盟国家中仅次于法国(470万)、超过英国(286万)的拥有第二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鉴于穆斯林妇女较高的生育率以及穆斯林移民的持续涌入,预计到2030年

① Naika Foroutan, *Identity and (Muslim) Integration in Germany*,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3, p. 2.

② 德国“穆斯林问题”源于统一前的联邦德国(西德),而民主德国(东德)的穆斯林人口微乎其微。德国统一后,才逐渐有穆斯林迁徙到前东德地区定居。为行文方便,“德国”特指统一前的西德及统一后的德国。

③ Stephen Castles/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4th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00-101.

④ Joel S. Fetzer/J. Christopher Soper, *Muslim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2.

⑤ Sonja Haug et al., *Muslim Life in Germany: A Study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German Conference on Islam*, Nuernberg: Federal Office for Migration and Refugees, 2009, pp. 54-76.

德国穆斯林将增至 550 万 约占总人口的 7.1%。<sup>①</sup>

整体而言 穆斯林移民在德国具有以下若干显著特征。首先 穆斯林的多元化与土耳其裔人口占据多数的状况并存。穆斯林既非属于单一族群 更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 他们分别来自 48 个国家 按照族群、教派、语言、文化与政治倾向的断层线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态势。与此同时 穆斯林在德国带有鲜明的土耳其色彩 德国政府和社会往往从“土耳其视角”来看待和理解穆斯林移民及伊斯兰教。<sup>②</sup> 其次 集中居住的定居模式。穆斯林大都集中居住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莱茵-美因地区的传统工业区以及柏林、汉堡、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等大城市。伴随人数的猛增 穆斯林经营的旅店、商店、清真餐馆和屠宰场相继涌现 大量的清真寺、文化中心、宗教学校拔地而起 穆斯林聚集区日益扩大 形成了跟主流社会有着强烈反差的“族群飞地”。再次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在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上 穆斯林移民表现出来的低收入、低职业地位、高失业率、高辍学率、高犯罪率等 使之沦落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底层。据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土耳其裔穆斯林 尤其第二、三代移民构成了德国国内最弱势的群体。<sup>③</sup> 社会经济的边缘化严重制约了穆斯林政治参与的热情、机会和能力 造成其缺乏政治代表性和影响力。更有甚者 在西欧社会日益世俗化的今天 穆斯林移民的宗教信仰及特殊的生活方式愈益显得与德国社会格格不入、难以协调。

## 二、德国穆斯林的社会生活自足化

主要由于其特有的宗教性 德国的穆斯林具有一种行止于以宗教为向心力的生活圈之内的明显特点 而这构成了他们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为了认清这一点 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此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组织化和政教关系。

在穆斯林的生活世界里 宗教信仰占据至高的地位 德国穆斯林移民亦然如此。一般而言 穆斯林移民参与宗教活动或宗教团体主要基于三个诱因 即心灵慰藉、社会尊敬和人脉资源。宗教团体为穆斯林提供了参与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 凭借这类活动 既能增强教胞之间的凝聚力 也让客居异乡的穆斯林得到心灵的归属 重拾尊敬和自信 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 宗教团体还能为信众提供

<sup>①</sup>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2010 - 2030,"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1. <http://www.pewforum.org/The-Future-of-the-Global-Muslim-Population.aspx>, 访问日期: 2013-05-28.

<sup>②</sup> Mathias Rohe, "Germany", in Jorgen S. Nielsen (ed.), *Yearbook of Muslims in Europe*, Volume 4,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p. 245-268.

<sup>③</sup> Berli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Unutilised Potential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gration in Germany*, Berlin: Berlin-Institut für Bevölkerung und Entwicklung, 2009.

各种社会资源。作为宗教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组织化的宗教生活把孤立的个人信仰和个人行为有机地串联起来,这对于维系与强化宗教信仰至关重要。当首批穆斯林客工抵达时,德国几乎没有清真寺来满足穆斯林的宗教需求。于是,客工就在居住的客栈和务工的厂房里建起祷告室(prayer room);之后,穆斯林又把废弃的厂房或建筑改造为清真寺。早期的伊玛目(imam,领拜人)主要来自客工内部,这些人并未受过专门的宗教训练,因此“这个时期的伊斯兰带有大众伊斯兰的特征,建基在移民劳工的日常经历和习惯而非正统的神学教义。”<sup>①</sup>穆斯林早期宗教活动的另一特征就是带有鲜明的非官方色彩。某些被土耳其官方所禁止的宗教组织在德国积极从事宣教活动(da'w,达瓦),对客工和离散者的宗教生活颇具影响。“到上世纪80年代,土耳其当局意识到,如果让那些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牾的宗教组织肆意蔓延,势必对土耳其内部稳定构成威胁”。<sup>②</sup>自此以后,土耳其政府日益重视针对土裔侨民的宣教活动与政治控制。由此可见,外国政府或非政府的伊斯兰跨国主义对德国境内的穆斯林移民影响甚深。

清真寺是穆斯林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同时也是组织和动员各类文化、政治、经济等活动的载体,因此伊斯兰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主要围绕清真寺展开。如今,德国共有2342个清真寺社群,即以清真寺为轴心的伊斯兰社群。<sup>③</sup>所谓“伊斯兰社群”系指一个生产、遵循和支持某个特定的伊斯兰解释的社会宗教团体,透过其活动和组织网络,组成协会、联合会、基金会、教育机构和清真寺。<sup>④</sup>各类伊斯兰组织最初大都在当地活动,随后逐渐扩展至地区层面,到80年代几个全国性的伊斯兰伞状组织(Islamic umbrella organization)相继涌现,它们代表了德国大多数穆斯林的利益和立场,其五大组织兹列举如下:

(1) 土耳其-伊斯兰事务联盟(DITIB)。DITIB是土耳其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也是德国最大的伊斯兰伞状组织,由896个地方清真寺社群组成。1984年“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在科隆组建DITIB。<sup>⑤</sup>其伊玛目是土耳其官方的宗教公务员,受

<sup>①</sup> Andreas Goldberg, “Islam in Germany”, in Shireen T. Hunter (ed.), *Islam, Europe's Second Religion: The New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Westport, CT: Praeger, 2002, pp. 29-50.

<sup>②</sup> Jeroen Doomernik,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urkish Islam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A Comparis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18, No. 1 (January 1995), pp. 46-63.

<sup>③</sup> Matthias Kortmann/Kerstin Rosenow-Williams, “Islamic Umbrella Organizations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scourse on Islam in Germany: Self-Portrayals and Strategies of Interactio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3, No. 1, 2013, pp. 41-60.

<sup>④</sup> Ahmet Yükleyn, *Localizing Islam in Europe: Turkish Islamic Communitie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

<sup>⑤</sup>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 迪亚奈特)创立于1926年,是一个管理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事务的官方机构,隶属于总理办公室管辖。1972年迪亚奈特建立负责海外伊斯兰事务的专门机构,特别为侨居西欧的500多万土耳其裔穆斯林提供宗教社会服务。

土耳其大使馆宗教领事的管辖,这些人基本不会德语、对德国社会了解甚少。DITIB 的使命和宗旨是,为土耳其裔穆斯林提供宗教社会服务,传播官方世俗版本的伊斯兰教,强化与离散社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鉴于 DITIB 专门针对土耳其裔穆斯林,因此它并不能代表德国全部穆斯林的利益。

(2) 伊斯兰社群 Milli Görüs(IGMG)。IGMG 是德国第二大伊斯兰伞状组织,由 323 个清真寺社群构成。IGMG 始建于 1994 年,总部位于科隆附近的科蓬(Kerpen)。IGMG 肇端于政治伊斯兰倾向的 Milli Görüs 运动,伊斯兰主义者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于 60 年代末在土耳其创立了 Milli Görüs 运动。其宗旨和目标为促进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化,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sup>①</sup>自 70 年代初以来,Milli Görüs 积极在德国拓展势力。鉴于其反世俗、反西方的立场,Milli Görüs 未获邀参加“德国伊斯兰会议”(DIK),并长期受到联邦宪法保卫局(BfV)的重点监控。

(3) 穆斯林文化中心协会(VIKZ)。VIKZ 是苏莱曼运动(Süleyman movement)在德国的翻版,代表了“民间伊斯兰”的势力,它拥有 300 座清真寺。苏莱曼运动发端于苏菲派的奈格什班迪教团(Naqshbandi Order),它从 70 年代初就在西欧开展活动,到 1973 年该运动已在德国建造了 150 座清真寺。同年,这些清真寺在科隆共同成立了“伊斯兰文化中心”,这是当时德国第一个伊斯兰伞状组织。<sup>②</sup>VIKZ 意在帮助穆斯林的宗教实践,训练伊玛目,并提供“伊斯兰教育”及各种社会服务。

(4) 穆斯林中央理事会(ZMD)。ZMD 成立于 1994 年,其前身是德国伊斯兰工作委员会(IAK)。它目前是一个由 21 个土耳其、阿拉伯、巴尔干等地方伊斯兰伞状组织所组成的联合会。ZMD 宗旨是“促进德国的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精神,为穆斯林的宗教功修提供方便”。该组织试图充当全德穆斯林的代言人,被视其为 DITIB 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怀疑 ZMD 的资金来源于沙特领导的穆斯林世界联盟,并深受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sup>③</sup>

(5) 德国阿拉维社群(AABF)。AABF 是以阿拉维人协会为主体的伊斯兰伞状组织,正式成立于 1990 年,现由 130 个成员协会所组成。“阿拉维人”(Alevi)意指“阿里的支持者”,阿拉维教派(Alevism)通常被看作为什叶派的一个支派。在宗教

<sup>①</sup> Milli Görüs 一词源于突厥语的“Millet”,其意是“受律法保护的宗教社群”,而 Görüs 则意指一种观点或意见。1969 年,土耳其伊斯兰领导人埃尔巴坎出版代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纲领性宣言——“民族观”(Milli Görüs, national view),由此 Milli Görüs 就成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代名词。参见 David Vielhaber, “The Milli Görüs of Germany”, in Hillel Fradkin, et al. (eds.),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Vol. 13, New York: Hudson Institute, Inc., 2012, pp. 47-49.

<sup>②</sup> Gerdien Jonker, “Naqshbandi-Mujaddidi: Sulaymancis in Germany”, in Jamal Malik/John Hinnells (eds.), *Sufism in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71-85.

<sup>③</sup>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slam and Identity in Germany*, Europe Report No. 181, March, 2007, p. 10.

教义和仪式上,阿拉维派杂糅了什叶派、前伊斯兰及佛教的多种元素,加上阿拉维人并不在清真寺而是在“赛姆”(Cem houses,社区中心)践行集体礼拜和舞蹈,由此正统穆斯林不愿意把阿拉维派信徒视为真正的穆斯林。<sup>①</sup>

基本上,穆斯林在德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权威性的有机整体,各类伊斯兰组织为争夺“宗教场域”的话语霸权彼此竞争,为获取穆斯林社群的影响力而相互博弈,为谋取合法性、地位和财政援助等社会资源而竞相角逐。虽说这些组织的正式成员人数仍相对较少,但它们对穆斯林移民的影响却不可小觑,正是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整个穆斯林社群在欧洲的发展趋势。<sup>②</sup>如果说,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的组织大都依循族群身份的性质而组建,那么随着新世代穆斯林的不断成长,跳脱狭隘的族群边界、更具包容性、多元性的新型伊斯兰组织也随之发展壮大。然而,不同于生活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祖国,伊斯兰组织在德国处于这个非伊斯兰的大环境中,伊斯兰社群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嵌入在不平等、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德国既有的宪政体制的制约。

世俗性是西欧国家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意味着国家在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恪守政教分离。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欧各国在处理政教关系上无不带有本国的特色,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宗教治理模式。相较而言,德国采取了介于法国严格的世俗主义与英国宽松的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折衷进路;在对待穆斯林移民的宗教和文化实践上,德国比法国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却又比英国的包容性要弱。<sup>③</sup>德国的政教分离并不全然否认公共领域中的宗教维度。德国宪法《基本法》一方面确立了政教分离、保障宗教自由、不设立国家教会等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求国家与教会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基本法》第140条规定:国家赋予某些有历史渊源的宗教社群(团体)以“公法法人”地位,保护其法律自主性,“只要其他的宗教社群的成员构成和人数,能够提供它们永久性的证明,符合申请条件,即应赋予类似的权利”。《基本法》第7条还规定:在政府的监督协调下,被承认为“公法法人”的宗教社群,有权利在公共学校实施宗教教育。<sup>④</sup>一旦被国家赋予“公法法人”地位,该宗教团体将享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如教堂税征收、税

① Matthias Kortmann/Kerstin Rosenow-Williams, "Islamic Umbrella Organizations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scourse on Islam in Germany: Self-Portrayals and Strategies of Interactio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3, No. 1, 2013, pp. 41-60.

② Nadia Jeldtoft, "Lived Islam: Religious Identity among 'Non-organized' Muslim Minor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34, No. 12, 2011, pp. 1134-1151.

③ Joel S. Fetzer/J. Christopher Soper, *Muslim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pp. 102, 105.

④ Mathias Rohe, "Islamic Norms in Germany and Europe", in Ala Al-Hamaneh/Jorn Thielmann (eds.), *Islam and Muslims in German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pp. 49-81.

收减免、设施修建资助、公立学校宗教教育等。<sup>①</sup> 另外,德国的联邦制又把赋予“公法法人”地位的权限下放给 16 个州政府,由各州自行决定是否承认某一宗教社群的资格。

迄今为止,已有 20 多个天主教、新教及犹太教的教会获准拥有“公法法人”地位,而绝大多数伊斯兰组织还没有被德国政府赋予“公法法人”地位。究其原因,德国政府依旧视伊斯兰教为“外来宗教”或“移民宗教”,伊斯兰社群仍不是有 30 年以上历史的“稳定社群”,“它们未能符合《基本法》第 140 条的诸多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宗教社群”的标准。鉴于尚未获得“公法法人”地位,伊斯兰组织只能以“注册社团”(eingetragener Verein, e. V.) 或基金会(Stiftung)的名义登记注册,开展活动,无法享有宗教社群的特权,其实就是不承认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合法地位。<sup>②</sup> 鉴于这种情况,穆斯林认为这不过是政府对伊斯兰社群采取或明或暗的歧视和排斥的反映,因此迫切希望政府能够以平等方式承认其宗教信仰,赋予伊斯兰教合法地位,不再遭受误解和歧视,使之尽快融入德国社会。<sup>③</sup>

### 三、“穆斯林问题”的种族化、政治化、安全化及病理化

在早期,穆斯林客工的工作性质和集中居住,使之与德国社会的接触相当有限。因此,在文化上直到上世纪 70 年末、在政治上直至 80 年代末,穆斯林基本处于隐而不彰的态势,“穆斯林问题”并未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社会议题。<sup>④</sup> 不过,随着家庭的到来以及新生代的涌现,穆斯林在德国的永久存在已为既成事实。即便如此,德国政府依旧不愿意直面现实,不承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更遑论吸纳和整合穆斯林。

基于历史和传统,德国民族主义带有鲜明“血统论”、“族群性”和“原生论”的特征。德意志民族观认为,日耳曼民族植根于悠久的“部落风俗”和“民俗文化”,建基于共同的语言、哲学、艺术、音乐和习俗之上,这些文化要素是长期历史洗礼、塑造和传承之产物,正是它们铸造出日耳曼人的情感基因、集体意识及身份认同。

<sup>①</sup> Thomas Lemmen, *Muslimen in Deutschland. Eine Herausforderung für Kirche und Gesellschaft*, Baden-Baden: Nomos, 2001, S. 183.

<sup>②</sup> 德国阿拉维社群已在 5 个州被赋予提供伊斯兰教育的权利,而逊尼派的宗教教育已在柏林实施,并将推广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参见 Kerstin Rosenow-Williams, *Organizing Muslims and Integrating Islam in Germany: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 3.

<sup>③</sup> 德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无视穆斯林社群的压力,可能寻求一种折中的途径,赋予某些伊斯兰组织一定形式上的“软承认”,即给予其在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某种作用,但仍不承认其“公法法人”地位。上述观点是作者与约尔根·尼尔森教授的研讨。

<sup>④</sup> Bhikhu Parekh, *A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 Politic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99.

按照罗格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说法,这种特质可以用“德国属性”(Germanness)或日耳曼“文化性格”(cultural idiom)加以体现。<sup>①</sup>德国属性包含了这样一个认知和观念,此即:共同血缘构成了日耳曼社会关系和成员身份的基础;日耳曼是一个不可分割、无法杂陈的有机整体,而“主导文化”表达的是一个深层的文化统一和延续;德国是一个具有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正因如此,无论在官方话语抑或公共叙事中,德国十分强调自身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点,坚持自己不是一个移民国家。1981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社民党)一再表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应该且将来也不会为一个移民国家”;继任的科尔政府(基民盟)反复强调,德国不希望成为一个移民国家,并实施和强化了一连串针对移民的排斥政策,甚至到90年代后期,科尔政府在官方声明和文件中皆刻意避免使用“移民”一词。<sup>②</sup>与此相应,德国执行一套高度排他性的限制性公民身份制度,不愿意接纳与自己迥异的外来文化和外来族群。诚如希拉尔·埃尔维尔所言,德国对待穆斯林移民的政策不是基于同化穆斯林、鼓励土耳其人成为德国人,恰恰相反,德国不希望穆斯林移民成为德国人。<sup>③</sup>

德国不愿意吸纳穆斯林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相互对立、无法相容。至少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德国就存有强烈敌视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社会文化。在德国的历史叙事中,伊斯兰教、穆斯林始终作为“他者”、“外国人”、“野蛮人”的认知想象加以建构与再现。纵然如此,那时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毕竟远在神秘陌生的东方,但随着穆斯林移民在德国内部的大规模存在,原住民与穆斯林之间的差异愈加显露无疑,两者不仅生活习惯上迥然不同,在思想观念上也相去甚远。德国民众对于穆斯林的传统习惯,诸如头巾面纱、割礼、“包办婚姻”、“荣誉处决”、“清真屠宰”难以认同;对于某些穆斯林的特殊要求,譬如在公共泳池和医院实行性别隔离、建立伊斯兰金融机构、实施伊斯兰教法更是严词抨击;穆斯林建造清真寺、宣礼塔也不断招致本土民众和极右势力的强烈反对,后者以破坏德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景观和穆安津“唤礼声”扰民为由,迫使政府官员为建造清真寺的规划设置障碍。许多德国人认为,穆斯林并不与自己共享欧洲价值,在看待自由民主、性别平等、世俗主义等重大问题上,伊斯兰价值观与欧洲价值观截然对立、无法共存。“9·11”

<sup>①</sup>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②</sup> Kerstin Rosenow-Williams, *Organizing Muslims and Integrating Islam in Germany: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 114.

<sup>③</sup> Hilal Elver, *The Headscarf Controversy: Secularism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0.

恐怖袭击后,穆斯林又被广泛视为“安全威胁”,把穆斯林与恐怖分子等量齐观、伊斯兰教与“宗教暴力”相提并论,最终导致整个西欧社会的排外情绪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滋生蔓延。

固然,二战后以生物属性为标准的传统种族主义早已声名狼藉、江河日下,但是以文化和宗教差异为价值判断的新种族主义却日渐兴盛、大行其道。此“新种族主义”民粹情绪在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撰写的《德国自取灭亡》一书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此书不但高居2010年德文非小说类畅销书之榜首,销售超过100万册而名噪一时,它更集中体现了德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刻板印象、负面认知以及情绪化的反伊斯兰话语。扎拉青认为,德国的本土文化正面临被穆斯林移民潮吞噬之虞,“土耳其人正凭借高出生率占领德国,与阿尔巴尼亚人占领科索沃如出一辙”;“穆斯林降低了整个德国人的智商,好逸恶劳,一味依靠国家而不愿自食其力,拥有太多的子女,既不愿也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不希望我们子孙后代生活在以穆斯林为主或大片地区讲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的国度,更不希望笼罩在妇女戴头巾,每天生活节奏依祷告召唤而定的氛围之中。”<sup>①</sup>

实际上,德国政府和社会在对待“穆斯林问题”上已表现出强烈的“种族化”、“安全化”、“政治化”和“病态化”的趋向。所谓“种族化”(racialization)就是把所有来自不同地域、文化、族群、语言的穆斯林化约为一个以宗教归属为基质的、事实上的新的种族范畴来加以歧视、排斥和污名化。“成为穆斯林不仅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事实,‘穆斯林’是一个族群范畴、一个信仰和身世的描述,穆斯林成为欧洲新的宗教少数族裔。”<sup>②</sup>而“政治化”(politicization)把西欧出现的所有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都简单归咎于穆斯林移民,视伊斯兰教为妨碍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社会、引发社会分裂和冲突的渊藪,从而导致了以炒作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威胁的主要诉求的极右翼民粹政党死灰复燃、重新崛起,德国的新纳粹势力和“独立民族主义者”正是这种思潮和运动的具体反映。<sup>③</sup>“安全化”(securitization)则把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划等号,将其视为对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文化的生存威胁,借此要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不惜侵犯穆斯林的基本人权和尊严来加以遏制和清除。尽管在德国境内尚未发生过以伊斯兰名义的重大恐

<sup>①</sup> Thilo Sarrazin, *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 München: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2012.

<sup>②</sup> Jytte Klausen, “Muslims Representing Muslims in Europe: Parties and Associations after 9/11”, in Abdulkader H. Sinno (ed.), *Muslims in Western Poli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6 - 111.

<sup>③</sup> Nancy Foner/Richard Alba, “Immigrant Religion in the U. S. and Western Europe: Bridge or Barrier to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2, No. 2, Summer 2008, pp. 360 - 392.

怖事件,也几乎没有穆斯林移民介入“全球圣战主义”,但德国政府仍把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视为国家的严重威胁。“病态化”(pathologization)意味着以扭曲的观点和态度来看待穆斯林的融入问题,使社会笼罩在害怕和恐惧伊斯兰的非理性的心理状态中。事实上,化约论和本质化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认知、媒体歇斯底里的炒作和渲染以及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和煽动,只能使整个社会陷入集体焦虑和道德恐慌之中,只能加重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社群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于普遍存在的社会歧视、排斥和污名化,加剧了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疏离感。许多穆斯林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中,无法摆脱社会经济的卑微地位,难以克服社会环境的敌视氛围。许多新生代穆斯林诉诸伊斯兰信仰、穆斯林认同,去寻求生活的意义。据2009年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对2417名16岁以上年龄穆斯林的调查表明,“非常宗教的”和“相当宗教的”两类共计占据86.4%的比例,伊斯兰认同已日益成为穆斯林多重认同的核心。<sup>①</sup>显然,穆斯林诉诸或强化宗教身份认同,是宗教抗争、承认政治和逆反性认同的彰显,是回应政府政策、法律和社会话语的制度结构性排斥、歧视和污名化的结果。这样必然导致穆斯林以“我们对抗他们”的态度和情感来对待接受国社会,无益于促进穆斯林的社会融入进程。

#### 四、新时期德国政府的社会融入政策

跨入21世纪之后,德国政府开始直面现实,不得不承认德国已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移民国家。尤其在一连串震惊欧美的伊斯兰恐怖事件爆发后,在加大反恐力度、强化反恐机制的同时,德国政府出于对穆斯林移民边缘化和极端化的担忧,逐渐关注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试图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旨在消除“安全隐患”、打破“平行社会”的族群鸿沟,力求整合吸纳穆斯林社群。

首先,修改公民权制度,放松移民归化入籍。1998年由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社民党和绿党)赢得大选后,便着手调整和积极推动移民和融入机制的改革进程。2000年,施罗德政府颁布了新的《公民身份法案》。<sup>②</sup>该法案将出生地原则(jus soli)引入德国公民身份和归化政策之中,改变了过去一味强调“血统论”(jus sanguinis)的传统,这样,在德国出生的穆斯林就有可能申请成为德国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长期存在的排他性的公民身份政策。结果,德国外国移民的入籍归化率从1980年的0.3%、1990年的0.4%提高到2000年的2.5%,大体上与西欧其

<sup>①</sup> Sonja Haug et al., *Muslim Life in Germany: A Study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German Conference on Islam*, p. 141.

<sup>②</sup> Kerstin Rosenow-Williams, *Organizing Muslims and Integrating Islam in Germany: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p. 106.

他国家的水平持平。<sup>①</sup> 如今,已有 200 万穆斯林获得了公民权,约占穆斯林总人口的 45%。

其次,强化文化整合,促进公民融入。德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一致认为,“穆斯林融入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所谓“融入”实质上是指“文化融入或同化”,无论如何,语言和文化始终扮演着社会凝聚的重要功能。<sup>②</sup> 而现实困境是,即便是拥有德国国籍的穆斯林日渐增多,但他们不过是“拥有德国护照的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要跨越形式上的公民身份,就必须加大穆斯林的文化融入。2000 年颁布的《公民身份法案》就规定了“公民融入”的相关要求,是年专门负责规划移民融入和发展政策的莉塔·聚斯慕特(Rita Süßmuth)移民委员会成立;2005 年《移民法》重新界定和规范了德国居留权和公民权,要求所有申请归化入籍的外国人须符合相应的“公民融入要求”。<sup>③</sup> 2006 年 7 月德国政府首次召开全国融入峰会,总理默克尔与会,并着手制定全国融入计划(NIP)。德国政府认为,“问题关键在于缺乏德语能力、缺少高等教育和高失业率”,“没有足够教育,整合不复存在”。总之,关注教育赋权和职业培训、通过教育和语言能力的提升、以期增进相互理解、社会参与和就业成功已成为德国融入议程的主轴。

最后,组建“德国伊斯兰会议”,完善宗教治理机制。为加强和穆斯林社群之间的接触、沟通和合作关系,2006 年 9 月德国政府发起了“德国伊斯兰会议”,试图搭建一个政府与穆斯林社群之间的对话协商平台。“德国伊斯兰会议”的口号和目标是“由穆斯林在德国走向德国穆斯林”(Muslims in Germany — German Muslims)。时任内务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明确表示“伊斯兰教是德国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一部分,欢迎穆斯林在德国的存在。”<sup>④</sup> 伊斯兰会议由 15 个政府代表与 15 个穆斯林社群代表,进行定期的直接沟通对话。

“德国伊斯兰会议”旨在充当穆斯林社群与政府之间相互沟通对话的全国性协商机制,强化国家对伊斯兰事务的控制,并意在减少外部宗教势力和跨国网络对本国穆斯林事务的渗透、影响和干预,培养熟悉本国文化传统的土生土长的伊斯兰宗教人士,推动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进程,发展“温和中道”的伊斯兰力量,强化政

<sup>①</sup> Ruud Koopmans et al. *Contested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 39.

<sup>②</sup> Faruk Sen, “Euro-Islam: Some Empirical Evidences”, in Ala Al-Hamarnah/Jörn Thielmann (eds.), *Islam and Muslims in German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pp. 33-48.

<sup>③</sup> Anika Haverig, “Managing Integration: German and British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From Within’ Post-201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 14, No. 2, May 2013, pp. 345-362.

<sup>④</sup> Frank Peter, “Welcoming Muslims into the Nation: Tolerance, Politics and Integration in Germany”, in Jocelyne Cesari (ed.), *Muslims in the West after 9/11: Religion, Politics and Law*,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19-144.

府与穆斯林社群之间的接触、理解和合作,缓解彼此间的敌对情绪。此前未能得到官方承认的伊斯兰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政府的认可。正如乔纳森·劳伦斯(Jonathan Laurence)指出的,“在过去20年间,欧洲组织化的伊斯兰已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由过去的无规制、无辨别、无资金的伊斯兰,逐步走向置于国家监控下、接受与此联系的福祉和限制的态势”。<sup>①</sup>与此同时,为解决伊斯兰组织群龙无首、散沙一盘的乱局,2007年土耳其-伊斯兰事务联盟、穆斯林中央理事会、伊斯兰文化中心协会伊斯兰理事会(IRD)等全国性组织专门成立“穆斯林协调委员会”(Koordinationsrat der Muslime, KRM),力求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发出同样的声音,充当起德国穆斯林的代言人。

当前,德国穆斯林的社会融入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论从主客观条件来看,皆不利于营造穆斯林融入的和谐氛围。一方面穆斯林群体的低下社会经济地位、特殊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严重妨碍其参与德国社会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另一方面德国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殊主义和社会文化,以及四处弥漫的“伊斯兰恐惧症”,导致主流社会不愿意吸纳穆斯林。对此,穆斯林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力求将伊斯兰信仰与西欧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借助集体认知的转换,培育德国穆斯林或者土耳其裔德国人、德国土耳其人等新的混合认同。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亦应责无旁贷地帮助穆斯林摆脱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弱势族群合理的社会资源和创造更多社会参与机会,以宽容理解的心态看待迥异的宗教文化。正如欧盟移民融入政策共同的基本原则所主张的,“接受国必须为移民创造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参与的机会。”<sup>②</sup>唯有跳脱传统刻板印象的思维和政策框架,抛弃“伊斯兰恐惧症”的心态来看待伊斯兰,摒弃“伊斯兰安全化”的立场来对待穆斯林,尽可能地鼓励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sup>③</sup>双方只有建立一种和谐、共存与友善的接触和对话关系,才能增进彼此了解、相互体谅及共同合作,方能逐渐跨越族群文化边界、打破社会隔离藩篱,在共同的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的框架下,最终实现穆斯林移民的平稳融入。

责任编辑:郑春荣

<sup>①</sup> Jonathan Laurence, *The Emancipation of Europe's Muslims: The State's Role in Minority Integ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12.

<sup>②</sup> European Union, *The Common Basic Principles for Im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Brussels, 2004, p. 19.

<sup>③</sup> Jocelyne Cesari, "Securitization of Islam in Europe", in Jocelyn Cesari (ed.), *Muslims in the West after 9/11: Religion, Politics, and Law*,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9-25.

## **Muslimische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und ihre soziale Integration**

**Hu Yu**

Nach Immigrationswellen von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wächst die muslimische Bevölkerung in Deutschland rapide, mit den Türkischstämmigen als ihrem Hauptteil. Dementsprechend entwickeln sich verschiedene islamische Organisationen, die den muslimischen Migranten weitgehend religiöse und gesellschaftliche Dienstleistungen anbieten und gleichzeitig auch Träger sowie Antriebskraft für ihre religiöse 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n wie auch politischen Ansprüche geworden sind. Doch die muslimischen Migranten stellen ein Problem dar, nicht nur wegen ihrer schwächeren sozialen und wirtschaftlichen Stellung und ihrer besonderen Lebensformen, sondern auch wegen der gängigen Verfeindung, Ausgrenzung, Diskriminierung und Islamophobie in der Gesellschaft gegenüber Muslimen und dem Islam. Die „Muslimfrage“ entartet sich dadurch schnell zu Rassenfrage, Politikum, Sicherheitsfrage und zur krankhaften Psyche. Die Aufnahme und Integration von muslimischen Migranten entwickelt sich zu einer unausweichlichen und dringend zu lösenden Herausforderung der deutschen Regierung und Gesellschaft.

## **Interkulturalität und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Wang Zhiqiang**

Heute, wo die ökonomische Globalisierung fortschreitet, stellt die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für eine erfolgreiche internationale Kommunikation die unverzichtbare Schlüsselqualifikation dar. Unter dieser neuen Kompetenzanforderung an die Fachkräfte des 21. Jahrhunderts sollte sich das Studienfach Germanistik in China dementsprechend modernisieren und sich von der Sprache und Literatur hin zur Kultur- und Interkulturalitätsausrichtung wenden. Demzufolge versucht der vorliegende Artikel, die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auf deren interkulturelle Spezifika mit dem Ziel darzustellen, wie sich die germanistischen Fächer und Studiengänge kulturell und interkulturell gestalten lassen. Anders als die traditionelle Germanistik, die zur Betrachtung der literarischen Werke eher die zeitliche Distanz im Blick hat, legt die